

CHANGJIANG LIUYU QUYU WENHUA
DE JIAORONG YU FAZHAN

长江流域 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

主编 ◎ 徐希平



四川大学出版社

CHANGJIANG LIUYU QUYU WENHUA
DE JIAORONG YU FAZHAN

长江流域 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

主编 ◎ 徐希平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何 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界·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 / 徐希平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14-8126-4

I. ①长… II. ①徐… III. ①长江流域—区域文化—文集 IV. ①G1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3086 号

书名 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

主 编 徐希平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126-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37
字 数 72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 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西南民族大学国学研究中心
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编 委 会

顾 问：沙马拉毅 曾 明

主 任：徐希平

副主任：杨 荣 戴登云

编 委：（以汉语拼音为序）

蔡伟民 戴登云 邓文彬 李光荣 李 欧

罗庆春 田耕宇 王启涛 万 果 吴贤哲

徐希平 杨 荣 钟如雄

目 录

第一辑 巴蜀文化研究

巴蜀文化概说	谭继和	(3)
“庙学合一”的创举：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	舒大刚	(19)
刘师培入川形迹交游略考之一	黄锦君	(48)
妈祖与川主：从人到神的两个范例	彭邦本	(59)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林移刚	(68)
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与发展	粟品孝	(79)
试论地理环境与多元民族文化形成之关系 ——以“藏彝走廊”四川甘孜州九龙县为例	刘 波 王 川	(88)
试论禹与蜀地之渊源关系 ——边缘视野下“禹兴西羌”考辨	张伦敦	(94)
杜宇传说之史实探讨	何 丹	(114)
刘备起兵时间小考 ——与任乃强前辈商榷中平五年说	朱锦程	(122)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吴 超	(128)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三国文化 ——三国文化中蜀汉主体地位的确立	刘森垚	(135)
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清代地方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中心	吴佩林	(146)
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的文献价值	王晓晖	(156)
张南轩著作整理的几个问题	杨世文	(167)
论廖平的文献学思想与实践	刘思文	(185)
“威震华夏”钩沉 ——《资治通鉴》忽略的《三国志》、注史料	瞿正瀛	(192)

苏东坡成长经历之要素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之启示

- 苏轼对“情圣”杜甫的接受与情感教育实践略论 徐希平 (207)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唐明贵 (215)
 苏轼草书笔法理论辨正 王万洪 (224)
 张栻学术的几个特点 郭齐 (234)
 梁平“崛起真儒”来知德 王小红 (242)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

- 廖平经学早中晚三期分期新说 吴龙灿 (252)
 贺麟译学大义述

- 兼与严复、王国维、陈康比较 彭华 (262)
 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民族思想 张勇 (279)
 从二到三:《太玄》蜀学渊源浅探 许晓宇 (287)
 玄妙神奇中的豪情志气与闲情阴郁里的春花秋雨

- 四川现代乡土文学地域书写中的巴蜀文化识别 涂鸿 (295)
 浅论古代文人传统中雪竹意象的塑造 张蕾 (303)
 绍圣后苏轼心境鸟瞰 潘玥 唐瑛 (310)
 宋代巴蜀杜诗学概论 彭燕 (317)
 理学本色与文士情怀

- 魏了翁《渠阳集》探析 彭敏 (323)
 饮食苏轼论 尹波 (334)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饮食文化浅析 张黎虹 (342)
 2012年巴蜀文化研究综述 李钊 (359)

第二辑 湖湘文化研究

- 湖湘土人的崇文尚武精神 朱汉民 (373)
 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其基本面相 陈先初 (386)
 近代湖南人的性格特征试析 余文华 陈宇翔 (403)
 湖湘文化二重性反思 蒋海松 (413)
 从家族书院到乡村书院的变迁

- 清代湖南郴侯书院史实考述 兰军 (424)
 论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生口”及相关问题 熊曲 (432)
 孙吴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 从孙吴前期的文书错误现象说起 苏俊林 (445)

目 录

王船山“习与性成”人性论之补见

- 论“习”字未被重视的“习行”义 申 健 章启辉 (458)
宋恕与谭嗣同

- 以《仁学》为中心 杨际开 (465)
论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引介和评析 李伏清 彭文桂 薛 洁 (489)
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 罗宗宇 翟翊翔 (500)
论李鸣生及其报告文学创作 章罗生 (507)

第三辑 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的互动

江源是华夏儿女的人文故乡

- 由大禹启蒙的古代中国人的“小康梦” 祁和晖 (523)
杜甫对蜀、湘文化的价值

- 以《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为中心的讨论 刘晓凤 (530)
五代时期巴蜀与湖湘割据政权比较研究 王明前 (537)
石头旧事：从襄阳米芾到蜀南陈代卿

- “洞天一品”石匾札考 向以鲜 (545)
晚明湘潭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关系考 朱志先 (549)
推进湖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路径探析

- 以文化的内容形态为中心 熊 霞 梁桂莲 (554)
土家族文化对恩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 陈丽琳 崔胜伟 (575)

- 后 记 (584)

第一辑 巴蜀文化研究



巴蜀文化概说

谭继和

郭沫若先生在 1934 年 7 月 9 日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林名均先生的回信中最早提出了“西蜀文化”的概念，并且提出研究和发掘“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后来，卫聚贤先生在 1941 年主持出版了《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才把它扩大为“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因为林名均先生向郭沫若报告了 1929 年在广汉月亮湾（三星堆）农民燕道诚家田地上发现玉器坑，接着就由葛维汉、林名均主持该地考古发掘的情况，郭沫若据此才提出了“西蜀文化”的命题。

根据上述过程，学术界一般认定 1929 年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的起点，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葛维汉与林名均是“华西科学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不过，那时的“巴蜀文化”概念，主要还是指秦汉以前的巴蜀考古文化。到 20 世纪 60 年代，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先生才初步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的惊世发现，苏秉琦、李学勤等先生才提出了“自成一系”、独具特色的“古蜀文化区系”的概念。继之由谭洛非、谭继和等人提出了巴蜀文化应突破狭义的“四川史前文化”的概念，扩大为由古及今的广义的“泛巴蜀文化”概念。现在，学术界一般使用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有关它的研究，以 1929 年为起点，至今已有 84 年历史。

一、什么是巴蜀文化？

（一）什么是巴？

关于巴字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文解字》讲：“巴，食象蛇也”，巴字就像一条吞大象的蛇。《山海经》记有巴蛇食象的故事，这只大蟒蛇吞掉这只大象，消化了三年，才把它的骨头吐出来。二是讲“巴”就是“坝”，两字同音。巴多大山，多小平地，习称为“坝坝”，故用巴音来称巴人。三是巴字

来源于“巴贯”，指石板。四是指嘉陵江多曲流。“阆水曲折三回如‘巴字’”。阆水即嘉陵江，嘉陵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多曲流，形状像个“巴”字。例如，古阆中就是“巴”字形山水城镇格局。

巴的区域是指哪个范围？最早是指秦的巴郡，到两汉三国时期被分为巴东郡、巴郡和巴西郡，统称为“三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很广，东到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北到陕南汉中地区，包括嘉陵江流域及汉水上游区域，南到黔涪之地，就是黔中和湘西地区，同夜郎国文化交融，西侧大体上以涪水为界与蜀交叉相接。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族群也通称为巴。“巴”这个地域名称，应该说在夏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在相传大禹与伯益著的《山海经》里已记载有“西南有巴国”，夏启的臣子孟涂主管巴地神祇的事。古巴人分为两支，一支是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另一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这是巴人两支不同的来源。廪君蛮的习俗是敬拜白虎，而板楯蛮的习俗是射杀白虎，两者的区别在对白虎是敬或畏上。不过，不管是拜还是射，对白虎“敬”为神灵的本质是一致的，白虎是巴人的文化标志。今天的土家族就是从廪君蛮和板楯蛮发展来的。他们至今还保留着巴人这样两种习俗。在神龛上供着白虎的，叫“坐堂白虎”，来源于廪君蛮敬重白虎的习俗；在大门上刻着白虎，希望白虎不要进他的家，当作门神供起来，这叫“过堂白虎”，来源于板楯蛮射杀敬畏白虎的习俗。

巴人的中心活动区域是嘉陵江，古称渝水。巴人首先在阆中建都，逐步南迁，最终建都于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在阆中建都的巴人曾帮助周武王伐纣，“歌舞以凌敌”，唱着巴渝曲，跳着巴渝舞去打仗，这是当时巴人的风俗。到汉初，巴人仍然以巴渝舞凌敌，帮助汉高祖夺天下，立了大功。汉高祖刘邦就减轻了他们的赋税，每家只交十贯钱，这十贯钱又叫作一寔。所以自那以后，巴人又改称为寔人，今天从阆中到渠县还有不少寔人文化遗存、遗物与遗迹，所以，今广安、南充直至达州地区，又称为寔人文化区域。

（二）什么是蜀？

蜀字来源于野蚕的形状。蜀的本意就是《诗经·豳风·东山》讲的“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尔雅·释文》称为“桑中蚕”。《诗经毛传》把蜀字就叫作“桑虫”。这个桑虫和今天的家蚕有区别。《韩非子》把它区别为蜀和蠋两个字，指的是家蚕和野蚕两种。蜀字最早的来源应该是指野蚕，就是毛毛虫。四川话就叫“猪儿子虫”，是古蜀人的食物，是原始部族蜀人采集食虫时代留下来的习俗。

蜀的区域是指哪个范围？最早指秦的蜀郡，到汉代被划分为三个郡，即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统称为“三蜀”。在古文献当中，作为古地名，记载的

有蜀山，就是现在的岷山。早在黄帝时代，他的儿子昌意，孙子颛顼，又叫高阳氏，他们世代同蜀山氏通婚。黄帝玄孙大禹承袭高阳氏颛顼一系，“兴于西羌”，出生于今岷山区域，今汶川、北川、茂县、理县等多处有传说他出生的石纽和禹穴遗迹。因此，蜀人是属于古民族颛顼集团一系的。蜀的先祖没有准确的世系，历史很迷茫，我们至今还找不到像《竹书纪年》有关中原夏代世系、甲骨文有关商代君主世系这样很准确的记载。只有古蜀五祖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一些传说。尽管历史记载迷迷茫茫的，传说很多，但今天考古发现的古蜀国却很神奇神秘。周原甲骨有蜀国的记载，而且与巢国相连。这个蜀国，通过考古知道，即是在殷墟中期出现的高度发达辉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都邑的迁徙转移。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就迁到成都城西的金沙遗址来了。

这样看来，从最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说，蜀和巴都是包含着地名、人称、古国称、文化称谓等等概念在内的多层次的复合型概念。

（三）什么是“巴蜀文化区”？

古三巴与古三蜀的地理范围，以及周边“与巴蜀同俗”的地区，统称为巴蜀文化区。这个文化区超过了我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范围。它是指中国的西南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稳定的地域共同体。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它的外延地域，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南边包括贵州、湘西山地这样一些“与巴蜀同俗”的地方。

在战国以前的文献里，巴和蜀一直都是分开称呼的，直到《战国策》才出现“巴蜀”连称。在甲骨文里有巴方，在周原甲骨里有伐蜀的记载，当时蜀国是巢国邻近的一小国，但从来没有“巴蜀”连称。《左传》有巴子、巴国，但没有蜀国，有个“蜀”字，是山东的一个地名，这是很奇怪的。直到战国时代，《战国策·秦一》才把巴和蜀这两个区域第一次连称在一起，合称“巴蜀”。这个“巴蜀”合称过程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巴与蜀地域相连，在远古是两支各自起源与发展、各有自己的文化性格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两支文化才互补交融和认同，统一为一个区域文明。到战国时代才把这个“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共识固定下来。到了汉代，《史记》、《汉书》才真正把握住巴蜀是“同风同俗”的，甚至相邻的汉中、关中区域都“同风同俗”，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域风俗，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

（四）什么是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就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依托，北到天水、汉中，南到滇东、黔西，

这样一个大范围内，起源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悠久而各自分别的始源并长期交融、不间断发展至今的一支地域文化。我们中华古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苏秉琦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作满天星斗在起源。各个区域文明先后在各地起源，后来经过互相交融、互相认同的长期过程，最后形成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这样一个悠久的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共同体。巴蜀文化是其中的一支，指的是起源于长江上游流域，有长期连续不间断性发展进程，直到今天还活跃着的中华一个区域性文化。

（五）巴蜀文化同今天四川省的关系

古巴蜀文化区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当然北及汉中，南到滇黔相关地区，都属于它的范围。今天的四川省地域包括蜀郡和“三巴”中的巴西郡全部以及巴郡的一部分，重庆市则包括巴东郡和巴郡的一部分。四川地域是巴蜀地域的主体，所以今日四川省也是巴蜀文化的主体，是巴蜀文化区的核心区域。

二、巴蜀文化生长与发展的基本轨迹

巴蜀文化基本发展的轨迹长达 4500 年以上，由古至今可以分为四大发展阶段：一是巴蜀古城古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阶段，二是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三是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四是古典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近现代 170 余年发展阶段。

（一）先秦时期，巴蜀古城古国和古方国文明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 它包含两个阶段。

1. 古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时代

以距今 4500 年前的成都平原十座古城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为起点，昭示着巴蜀已进入由古文化的积累发展到古城文明诞生的时代。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文化亮点是新津宝墩遗址，其古城总面积达 270 万平方米，可与新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相媲美（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达 290 万平方米）。两座古城，一在东部，一在西部，规模庞大相似，均具有当时当地古国国都的规模，标志着良渚文化和巴蜀文化早在四五千年前已经孕育出文明因子，进入文明阶段，改写了良渚文化与巴蜀文化文明曙光初露时期的历史。还有一个文化亮点是 4500 年前宝墩文化中的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约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内有平行的五个卵石堆砌的祭台遗址，应是西蜀人祭祀集会场所，它是西蜀城市文明起源的标志。正如〔美〕芒福德·刘易斯所说，各方人口朝觐的共同信仰的礼仪中心的出现，是城市起源的标志，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上源，应在陇蜀即岷山区域。茂县 6000 年前营盘山遗址的发掘，为寻觅这个上源，也就是蜀文明的上源，初露

出闪亮于天际的曙光。

2. 古巴蜀青铜文明时代

三千多年前殷代中晚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殷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展现出高度发达的神奇神妙的青铜文明，是巴蜀文化发展到古方国阶段的标志。三星堆古城和金沙古城先后是古蜀王国的王城。

从古蜀传说来检视，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名称很有趣。蚕丛，从字面看，似指野蚕丛集，是采集经济原始食虫部族的写照。柏灌似与都江堰的观坂有关，是初级灌溉农业的写照。鱼凫即鱼鹰（鹭鹚），是渔猎经济生活部族的代称。这三个名称，正好同由原始采集经济发展到渔猎经济，再发展到初级农业与产牧相结合的时代演进序列相契合，这是巴蜀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三代蜀王大致同文明起源阶段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的“三部曲”相当。第四代蜀王杜宇，是巴蜀农祖，第一个开垦成都平原至富庶的人，教蜀亦教巴务农，被称为“土（杜）主”。其在位时期也是古蜀以农业立国而发展成大方国的时期。第五代蜀王开明氏共有十二世，是水利兴农的大方国时期。

总之，传说中的古蜀国五代蜀王和蜀人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于川西平原从宝墩古城文明形成时代到三星堆、金沙古国和古方国青铜文明鼎盛时代这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深厚坚实的文化土壤之上。

这一时期的文化亮点：

第一是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的十二桥文化，已经由成都平原北缘发展到了成都平原腹心。3000多年来，从金沙时期开始，成都城址再也没有迁徙过。自开明九世以来，成都这个城名始终没有改动过。成都是全国唯一“城不改址三千载，址不改名二千五”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世界都市历史上都罕见的特征。

第二是“古蜀仙道”传承三千年。《华阳国志》说：蚕丛、柏灌、鱼凫“皆得仙道”，“治国久长，后皆仙去”，鱼凫率其部民畋猎湔山得仙道。杜宇魂化杜鹃，升西山归隐，啼血唤醒农夫春耕，开明王上天成为天门兽，皆是仙化故事，皆羽化而成仙。这些仙化故事正好同三星堆、金沙的遗物相印证。三星堆众多的青铜凤鸟形象、鹰头杜鹃形象、人身鸟足像、人面鸟身像以及有龙有鸟（龙凤）的青铜神树形象，金沙玉琮上线刻羽人像，直到金沙太阳神鸟金箔的想象的形象，深刻地体现了羽化成仙的文化想象力的内涵，印证了“古蜀仙道”信仰。道教就是在古蜀仙道的基础上创立的。巴蜀是仙源故乡，是昆仑仙学的发生地。神仙说的产生，巴蜀的昆仑仙宗早于齐鲁滨海的蓬莱仙宗，说明巴蜀是蜀人最早羽化成仙的仰望星空的文化想象力的起源处。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作蜀人多浪漫主义，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三星堆、金沙以仙化为特

征的艺术思维，形成后世巴蜀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显现出“巴蜀自古出文宗”的闪亮特征。

以上亮点构成古巴蜀文化发展主轴上的路标，成为蜀文化发展之路的阶梯。巴蜀是文明的生长点，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中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

（二）从秦汉到唐宋时期，天府农耕文明优越秀冠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汉代“天府之国”，直到唐宋的“扬一益二”，是巴蜀文化发展两次繁盛时期。其中的三国蜀汉与五代前后蜀时期，又是这两个巴蜀文化繁盛时期的光辉点和文化主轴上的重要路标。

这段时期作为文化路标性的亮点：

一是赢得“天府之国”的桂冠，创造了“天府之土，秀冠华夏”的历史记录，进一步凸显了巴蜀“水利蓄殖其国”的农耕文明特征。其结晶是都江堰无坝自流灌溉工程及其生发出来的扇形水系。邛崃河谷与成都平原，即都广之野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区之一，有先周农祖后稷葬于都广之野的传说。

二是巴蜀城市兴旺发展，当时居于世界城市的前列。汉代成都是全国五都之一，三都（成都、新都、广都）“号名城”，临邛是全国第一流冶铁城市。唐宋时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获得“扬一益二”的美誉，号称“天下名城之冠”。而当时的世界形势，自东罗马崩溃以后，欧洲很快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衰退，唯独汉唐中国一枝独秀，中国城市发展正处在旺盛时期。唐宋“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唐纪昭宗景福元年），成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前列，甚至是数一数二的“天下名镇之冠”的标杆城市，当然也就是世界历史名城中数一数二的城市。成都和扬州的区别是：扬州“富庶甲天下”（同上引书），但它是单纯的工商发达城市，“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新唐书·李袭誉传》）。成都则是农业富庶与工商繁盛兼而有之的城市，既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宜农之土，又是“市张列肆，货贿山积”，“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资治通鉴》唐纪昭宗大顺二年）的“西南一大都会”（陈子昂语）。甚至引发了是“扬一益二”还是“益一扬二”的有趣争论（唐·卢求《成都志序》）。

这一时期，巴蜀创造了世界漆艺中心，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临邛火井）、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标，最早的世界纸币“交子”的诞生地等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无愧为当时世界的一流城市。

三是“文翁兴学”，首创地方郡学，“开学校”，“以诗书教人”，“蜀有儒自公（文翁）始”（宋人宋祁语），儒风流布，蜀学大兴，从兹比肩于齐鲁。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文章冠天下”，“以文辞显于世”的天

下文宗多出西蜀的传统。

四是“蜀石经”的刊刻。这是十三经的首次完整结集，推动了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和“蜀儒文章冠天下”的发展。

在巴蜀从古至今的几个发展阶段中，以农业文明时期最长。“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巴蜀农业文明独有的“士民之庶，物力之饶，甲乎天下”的特征和蜀人“俗不愁苦，人多工巧”的生活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因其历史的悠长而成为巴蜀文化特质及其展现面貌的决定性因素。

（三）元明清时期，市民社会下层民众文化初盛阶段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巴蜀社会文化中出现了不少新质因素，尤其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因素，为巴蜀城乡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使得有“川味”特点的下层群众文化和“俗尚游乐”的休闲文化与怡人文化兴盛起来。随着巴蜀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以及适应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化日益活跃起来。

这一时期可作为文化路标性的成就：

一是川剧的兴起。川剧源于元北曲和明南曲，形成于清代中期雅部戏变为花部戏、地方剧种出现之时。乾隆年间金堂艺人魏长生创“四川秦腔”，在北京演出，轰动朝野，这是川剧的弹腔形成之始。古巴渝曲、竹枝词到汲取秦腔则成为高腔的来源，总之，川剧“昆、高、胡、灯、弹”五种声腔艺术就是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化融会过程中形成的，成为地方戏曲中有特色的瑰宝。

二是巴蜀是中国和世界最早发现茶树、种植茶树的地方，是茶文化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茶馆的兴盛和普及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许多茶馆兼有书场功能，是群众休闲怡人生活的重要体验地。

三是川菜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全国四大菜系之一。川菜传统特点是好辛香尚滋味，有三千年的独特传统。到南宋时，出现了“川食”名称，川食店开到了当时的汴京。陆游喜欢川食，自号“老饕”。到明清时，川菜包括小吃，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百味一体的“川菜”菜系，影响直到今天。

四是在府学、州学、县学的官学之外，兴起了书院教育。书院与官学有联系，但它直接继承孔子以来的私学传统，是体制外的，其主要目的是“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者居之”（朱熹语），主张自由论学重于八股科举。巴蜀的书院起于唐代，作为源远流长的蜀学的主要传承阵地，在推动蜀学，特别是宋代蜀学达于繁盛方面起了极大作用。明清蜀学主要也是因书院教育而发展起来并走向改革的。蜀学以文史并重、重在神髓为传统特色，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

（四）1840 年以来，巴蜀古典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 1840 年以后，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巴蜀文化受到近代文明的冲击，在阵痛中迈着蹒跚的步伐缓慢地步入近代化历程。特别是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古老的巴蜀文化出现激变和多彩的面貌，开始急遽地向早期现代化转换和裂变。这一时期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光绪元年（1875）四川省城尊经书院的创办。尊经书院奉行“绍先哲，起蜀学”，“贵躬行，不贵虚谈”，“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的办学宗旨，由山长王闿运开其端，推动了近代巴蜀文化的转型和复兴，培育了以廖平、吴之英、宋育仁、刘光第、杨锐为首的一大批通经致用、新旧学兼容而又特重今文经学传统的新蜀学人才，出现了蜀学会等维新组织，在四川开启了启蒙思想意识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最耀眼的新星是“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川籍维新文化人士（杨锐、刘光第），他们为启蒙理想贡献了生命，为启迪四川人的觉悟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阶段的文化亮点：

一是以“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为文化地标，象征着西蜀人文化心理群体性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由封建思想桎梏向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的转型，留下了巴蜀地域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史遗产，为百年来巴蜀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解放的锁钥。特别是川人杜鹃啼血的历史精神，经过辛亥时期“啼鹃诗人”雷铁崖以“家山危殆，愿效杜宇之啼”的救国主义的新阐释，使古典啼鹃文化成为新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啼鹃文化，丰富了杜鹃啼血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抗震救灾中，这一杜鹃啼血的历史精神也显示出了它的特殊作用。

二是“五四”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成都的兴起，促使一批知识化精英沿着留欧学统，开辟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追求真理之路。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周太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的吴玉章，“旅欧少共”的核心人物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人，留学法国，成就了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走向革命的人才。他们体现了“唯蜀有才，奇瑰磊落”（孙中山语）的巴蜀人才特点。

三是抗战时期全国高校内迁巴蜀，使成都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当时的成都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根据地”，成都华西坝成为巴蜀文化中西融合的现代化进程的光辉地标。

第二阶段，是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这 60 多年，同整个中华文化一样，是巴蜀文化走向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中国气派、巴蜀风格和巴蜀特色的巴蜀文态建设曲折演变发展的时期，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梦想百年历程